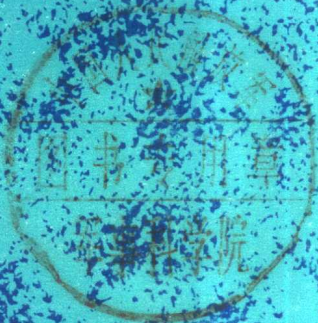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哲學史

資料匯編



遼寧大學
哲學院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册）

“力行”哲学批判

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二年二月 沈阳

目 录

知难行难	鲁 迅 (1)
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范文澜 (2)
谁革命? 革谁的命?	范文澜 (9)
袁世凯再版	范文澜 (14)
论“诚”	沈友谷(胡 绳) (16)
《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艾思奇 (24)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	艾思奇 (33)
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	吕振羽 (41)
驳蒋介石的文化观	齐燕铭 (50)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解放日报》社 论 (54)
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	《解放日报》社 论 (57)
请重庆看罗马	《解放日报》社 论 (58)
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解放日报》社 论 (63)
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	《解放日报》社 论 (68)
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	《解放日报》社 论 (70)
纪念孙中山批判蒋介石	《解放日报》社 论 (72)
评《中国之命运》	陈伯达 (76)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蒋介石 (92)
行的道理(行的哲学)	蒋介石 (100)
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	蒋介石 (107)
中国精神	蒋介石 (117)
中国哲学的哲学	胡一贯 (118)
唯生哲学的研究法	胡一贯 (122)
认识之新认识	胡一贯 (127)
力行哲学之新击节	胡一贯 (133)
论唯心与唯物	胡一贯 (138)
宇宙新论	胡一贯 (145)
哲学界对于社会风气之转移	胡一贯 (151)
哲学界对社会风气之改造	胡一贯 (156)
力行哲学的基本认识	袁月楼 (161)
力行哲学与伦理建设	袁月楼 (164)
唯生进化论与各派学说之比较	袁月楼 (170)
总裁底本体哲学	叶 青 (175)
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	刘熊祥 (179)

读《中国之命运》

——再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	刘熊祥 (184)
三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	刘熊祥 (188)
蒋总裁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陈元德 (193)
总裁思想概要·····	罗时实 (197)
总裁行的哲学探源·····	林坚寒 (200)
读《中国之命运》·····	陶希圣 (203)

知 难 行 难

鲁 迅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

“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

（十月十四日申报。）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选自《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

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范文澜

重庆中央社新近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篇中列举中国史实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也是喜欢谈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读了这篇文章，很有些大惑不解，愿意提供些意见，向文化界的先进求教。

在没有进入篇中具体问题的讨论以前，我觉得有简单地提出四个一般概念的需要。

第一：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里面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当然不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基本观点，而是凡属把握科学方法去研究文化历史等等问题的所有人们一致公认的基本观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信心，就是科学方法是消除一切成见意气。探求真理的最公正的保证。

第二：历史是不断运动的，不断变化的，不断革新的，不断发展的。无论何时，它总包含着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腐朽着的两个方面。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它也包含着新鲜的发展和腐朽的衰亡的两个方面。新鲜的发展的文化是符合或接近于人民大众的意志的，腐朽的衰亡的文化是发生于或保存于没落倒退者群里面的。因之，我们对于前者必需加以发扬光大，对于后者必需加以批评否定。

第三：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也不能凭臆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迎合自己主观的志愿。如果这样做，关于古代史，最起码的“纲鉴易知录”就会不答应，近代史属于所闻世、所见世的范围，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点含糊不得。

第四：王船山先生明亡后痛切地垂戒道：“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今天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七年，相持最艰苦的阶段，在文化问题上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发扬民族气节、鼓动民族道德、如何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进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欲横流罔识大义者们的将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卫以及一群不逞之徒的莠言谬论阴谋诡计，舍此而谈中国文化，我们必须警惕船山的遗训。

研究讨论中国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上述四点，这才不会笼统地谈传统继承。喜爱光明者决不继承黑暗的传统，黑暗的传统也决不能阻遏光明传统的存在和发展。泾渭异流，可以省却不少无谓的争论。

下面仿照六朝人论辨体，专就“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提出异议。凡称论曰……都是中央社社论原文，凡称辨曰……都是我的意见。

论曰：我们要以传统继承者自任，必须首先看清楚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只有促成政治统一的文化，没有助长封建割据的文化。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辨曰：谈文化，既指出它的统一性，更必需着重地指出它的斗争性，同时必须指出它的进步性正义性或倒退性反动性。谈统一，更必需区别革命性正义性的统一或倒退性反动性的统一。如果止谈统一性，又止谈抽象的空洞的统一性，那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日本法西斯强盗狂吠其所谓“日满华一体论”和“大东亚共荣论”（法西斯文化），汉奸汪精卫高叫其所谓“中国反共和平统一论”（汉奸奴隶文化），他们也都用所谓“中国只有促成政治统一的文化”做口实来欺骗人民，我们若不发扬正义的进步的抗战文化和他们斗争，坚决消灭他们的反动腐朽的血腥下贱文化，那末，就会发生谁统一谁和如何统一的严重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离开了斗争性和革命性来谈统一性，不是中国对日寇汪逆妥协的“统一”，就是日寇汪逆征服中国的“统一”，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统一的途径？因为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中央社这篇文章往后就发生了一联串的糊涂观念。

论曰：中唐以后二百年的思想界统一运动，造成了宋元明清一千年的统一国家……遍读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从没有一个替封建割据作辩护的。

辨曰：蒙元满清在当时不是异民族暴力征服汉民族的朝代么？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演中明明白白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孙先生说是亡国，这篇社论的作者却说是“统一”，难道亡国就是“统一”么？元清统治中国三百余年，汉民族曾不断起义反抗，以破坏那两个“统一国家”为神圣天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即曾以理论与行动坚决反对清末保皇党拥护当时“统一国家”的汉奸路线，国民党是同盟会的后身，理应发扬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不意国民党的代表宣传机关却公开歌颂元清的统一，并归功于“中唐以后二百年的思想界统一运动”！韩愈、周敦颐、程颢、朱熹之流提倡君主专制的奴隶文化是事实，奴隶文化在异族侵略下极易转变为汉奸文化也是事实，论者托命于号称民主共和之世，弄笔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对于这样的专制文化汉奸文化不加以严厉的挞伐，反而备予表彰，颂为典范，实属不可思议之至。若然，留梦炎、吕文焕、赵孟頫、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李光地以及无数大小汉奸都是赞助统一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郑思肖、史可法、黄道周、郑成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无数忠臣义士都是反对统一的“封建割据”者和破坏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罪人了。曾国藩卖身满清，破坏孙中山先生所再三赞美的太平革命，屠杀极惨，号称“曾剃头”，为今日一切大小汉奸开其先路；抗战以来的汪精卫，卖身日寇，倡言反共，破坏民族革命，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凡属国民孰不切齿痛恨，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照论者说来，难道他们也是赞成统一的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么？照论者说来，中国人好像是历来对于不论什么统治者的“统一”都是无条件拥护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徵，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建军据地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动统一者都是政治的“封建割据”。凡著书立说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对统一者，都是文化的“封建割据”。那末，孙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前，屡谋广东作革命根据地（按满清政府说是谋割据造反）以反抗统一的满清政府，在北伐以前，屡取广东作革命根据地（照北京军阀政府说是割据作乱）以反抗统一的袁世凯、段琪瑞、吴佩孚之流的军阀政府，也应该作为政治的“封建割据”，而孙中山先生一切鼓吹革命反抗的遗教，也应该作为文化的“封建割据”了。论者自称“遍读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事实说明，不特宋明两朝孤臣遗老的“作品”未曾翻阅，则三民主义唯一经典的中山遗著，似乎也未曾寓目，所谓“遍读”岂其然乎？

自然，依常理而论，中山遗著，论者一定是读过的，文天祥“正气歌”，史可法“答多

尔衮书”黄宗羲“原君”、“原臣”一类早已编入中学课本的名篇，论者一定也是读过的。所以似乎未曾读过的原因，大概由于对“封建”、“统一”、“割据”、“革命根据地”等词义不甚了解，因此在这里解释一下大概还是有益的。所谓“封建”，从政治上说，就是少数地主阶级专制的政治。一个国家在一个封建独裁者（皇帝或不是皇帝都一样）统治着的时候，叫做“封建统一”，同时有两个或几个专制独裁者据地争险，叫做“封建割据”。历史上有过进步的封建统一，也有过进步的封建割据。中央社社论说中国的统一国家“论规模则首推汉唐，论复兴则必称宋明”而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恰恰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割据开国的（刘与李氏父子据陕西，赵据中原，朱据南京），赵与朱还是篡了其他割据者的位，刘、李与朱又都是从直接破坏秦、隋、元三个“统一国家”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破坏统一”的割据都有很大进步意义，这大概是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能的不承认的；他如民族英雄郑成功割据台湾以反抗清的“统一”，至今妇孺都知道加以崇敬，类此的事例，更是不可胜数。但是现代的中国，处在民主时代，所需要的是民主的统一（如果没有民主的统一，至少也需要有民主的根据地为其准备与楷模），因此无论是封建统一或封建割据，就都是反动的了。在现代的中国，特别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即任何企图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专制或半封建专制来实行强迫统一的人，无论他暂时怎样拥有中央的政权、军权、财权仿佛不可一世，其封建统一的结果都不免流为封建割据，都不免因受到全国人民的反抗而败亡。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的统治，在没有遇到武力反抗时是封建的统一，在遇到孙中山、蔡松坡和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权反抗以后，就成为封建的割据了。今天的世界既是民主的反封建反独裁的世界，即令再有袁世凯式的统一出现，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不过是一种封建割据；况且中国已经加入民主阵营，中国人民经过早期的民主斗争，也都已熟知民主的必要，这种反民主的政治就更无统一全国的可能。至于在反对封建统一、封建割据或法西斯侵略的革命运动方面，当其统治力量限于一地区时，这个地区称为革命根据地，扩大及于全国时则称为革命的民主的统一。过去孙中山先生根据广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京军阀政府的封建割据，今天共产党创立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溥仪汪精卫等汉奸群的卖国封建割据，都是最好的例证。

论曰：远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思想界就起了“大统一”的运动，春秋的思想中心就是大统一，孟子就力主“天下定于一”，荀子就主张“调一天下”。

辨曰：孔孟荀在当时主张统一，确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他们这一思想的进步性，不在于笼统地主张统一，而在于主张应该用什么标准什么力量什么方法来统一。今文家说春秋讲大一统，同时讲故宋，黜周，以春秋当新王。孔子作易革卦彖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孟子赞美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王天下，劝齐宣王梁惠王学汤武的故事。荀子看到秦的经济比较进步，政治比较严明（灭六国后却一变而为多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于农民起义之手），不主张周的统一而预料秦可以统一。孔孟荀都是封建学说的创造者，中心思想不外乎如何保持并扩大君主的权利，不过他们懂得政治的是非和历史的趋势，不敢无视人民的公意，尤其是孟子还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他所说的“定于一”乃是定于民而非定于君，这比后世腐儒文丐一味提倡专制的独裁，盲目忠君，如汉奸周佛海未投敌前所宣传的“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者，智慧相差，是不能比较的。

论曰：中国文化之特点就在于充满了融和的力量，充满了统一的性能。由于这丰富的融和力与统一性，使中华民族能建国于亚洲大陆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如对于中国文化所蕴蓄

的统一性与由此统一性而发挥的融和力熟视无睹，纵然赞叹中国文化的优秀，也就等于卖椟还珠。

辨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高出于四邻任何种族，但当中国统治阶级腐朽到极度的时候，北方游牧部落种族如五胡、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仍能凭藉武力征服中国的全部或一部。这些种族里面的统治层，利用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豢养大批文武汉奸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样，他们虽然有意识地保存“骑射国语”，力戒被同化于“汉儿柔靡之风”，但历时既久，这个外来种族一方面生产方法前进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强健朴野之俗也就因中国旧统治阶层的腐化影响而消磨殆尽，逐渐“融和”在汉族里面（止有元顺帝回到长城以外，恢复了蒙古旧俗）。这个所谓“融和”，对于整个侵入民族诚然产生了进步的结果，但对于当时国亡家破，受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残杀蹂躏的汉民族，却是极可耻极可悲的。今天汉满蒙各民族的广大觉悟群众，以“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团结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丝毫没有种族的偏见和历史的成见，不过当以前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个恐怖时期，被侵入民族的忠义士民，却决没有如今之论者所说的欢迎侵入、以便将来用文化同化他们的那种令人肉麻的“大景”和“远见”。所谓“融和”既然并不是什么预定的计划，而只是一种无可如何的结果，那么，所谓融和的动力究竟是文化还是武力，所谓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还是征服，这样的问题，对于被侵入的民族就根本不能成立。自然，从侵入者看来，问题是很明显的：武力正是后来融和的动力，征服正是后来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汉民族中，有些人自己不愿认输，便说是“融和的动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为武力抵抗在腐败的投降的统治者手里失败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为自己被征服了！）这样说，若只为聊以快意，虽然阿Q的傻态可掬，也还罢了；但是论者一定要六发疾呼，说是“中国文化之优秀。就在于此，对比不加以“赞叹”“就等于买椟还珠”，很有些“鱼目混珠”的嫌疑。照论者说来，亡了国不但等于不亡，而且还是“充满了融和的力量”、“充满了统一的性能”的中国文化的大胜利，那么文天祥等人固不必说，即如岳飞的抗战也是多此一举，南宋甚至北宋对于辽金元也就都是论者所谓“封建割据”，只有秦桧张邦昌或者“外来”的石敬瑭一流人才是中国文化的先知先觉了。论者在鸦片战争百年后，抗日战争六年后的今天，还来重弹这种不抵抗主义的旧调，以所谓“融和性”掩盖求和性，以所谓“统一性”掩盖被统一性，诚不知其心何居。假如日寇据此提出要求道：“让我日本来与你们‘融和’‘统一’吧！这是你们贵国历史上文化上‘最重要的事实’，请你们连椟连珠一起卖给我吧！”试问论者能不能像溥仪汪精卫那样查照老例准予出卖呢？

如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一味吹嘘自己的所谓“融和性”“统一性”，已足使中国一亡再亡，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外的形势与以前更是完全不同了，外国侵略者的生产力高于中国，中国已经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亡了国还去“融和”人家，而只能被人家所“融和”了，这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更不是什么“融和性”“统一性”的问题，而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推翻封建专制，发动人民力量，学习外来科学，实行内部改革，藉以救亡图存的问题了。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一点，会造成近百年史无数次的大失败。当初满清统治者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庞然自大，提出“天朝至上”的口号，企图用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对抗，结果披靡溃败，国权残破。后来是懂得了而不愿意承认，因为承认了就得让位给人民，于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张之洞又苦心发明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它的实质就是保存固有的专制政治，拒绝新兴的民主革命，而欢迎舶来的“奇技淫巧”与坚甲

利兵,用以提高自己的享受和保护自己的统治——坚甲利兵而不与民主革命相结合,当然是只能“安内”,不足“攘外”的。所以这个口号显然最适合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口号在今天还可以偷运舶来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沆瀣一气,助长固有的专制主义,不过这样想的先生们要注意法西斯已经是一只死在俄顷、无法逃命的恶虎,全世界正义人士正到处打这只恶虎,冒冒然拿虎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一鸣既不足以惊人,一蹴更是驴脚毕露、柳宗元“三戒”之一的那篇文章,是值得深长思之的。这个口号又可以用以为投降外国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论基础,例如日寇在沦陷区宣讲“孔孟王道”,汪逆可以说:“这是中学为体呵”;日寇在沦陷区开矿造路,榨取人力物资,汪逆可以说:“这是西学为用呵”。假如不幸沦陷区与日寇竟这样“融和”起来,则论者又将奈之何哉?

落后的文化不能抵抗进步的文化,全人类历史进程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任何主观愿望或巧妙口号都不能改变它。试读中国近代史,大清皇帝的君主专制,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民权,在文化上是进步的。当时反动士大夫替君主专制遍贴“国产至上”的商标,说这才能“为体”,替共和民权遍贴“舶来至下”的商标,说这决不能“为体”,结果,辛亥革命证明了人民大众欢迎的是共和民权。北京军阀政府的遵孔读经、武力统一,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在文化上是进步的。当时反动士大夫又替尊孔读经、武力统一遍贴“国产至上”的商标,又说这才能“为体”,替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遍贴“舶来至下”的商标,又说这决不能“为体”,结果,大革命证明了人民大众欢迎的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种例证,举不胜举,实际整部人类历史(中国自然不能例外),无非是前进文化战胜倒退文化的记录,由此可知文化的兴替,关键在于进化程度的高低,在于是否适合于人民大众的需要,高者适合一定通过各个民族而发展,低者不适者一定相形见绌而趋于衰亡,,断断于“国产”“舶来”的上下,舌敌唇焦,目昏齿豁,徒自苦耳,甚无谓也。

论曰:在割据分立时期,往往有利用外来文化以为粉饰的事情。即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黄河流域的封建割据势力如石勒如姚萇,都曾特别提倡以维系人民的心理于一时,然而当时中国思想界便发生了反对的运动,首先是“夷夏论”,力持中国民族的思想,其运动之有力,终使佛教改向于中国化。中国毕竟没有因缘佛教而产生的割据战争。隋唐以后,佛教便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等到禅宗的改革运动勃兴,佛教从此避免它对于政府的冲突,佛教也就不再与中国的旧有文化起争辩而中国式的佛教更与印度大异其趣了。

辨曰:这一段议论,不知依据中国何种书史。姑就普通人习见的晋书、南北史、北魏书、隋书、新旧唐书、高僧传、弘明集、法显传、玄奘法师传、开元释教录等书看来,全然找不出这段议论的根源何在。五胡乱华是异族侵入中国北部,不得笼统称为封建割据。五胡酋长出身野蛮民族,确有迷信宗教者,石勒姚萇适逢名僧佛图凌、鸠摩罗什,这两位大师的产生并非他们“特别提倡”的结果,且北朝还有两次灭佛兴道的事,而“当时中国思想界”中心所在的晋宋齐梁的抗治者与士大夫,对于佛教之“都曾特别提倡以维系人民的心理于一时”。却尤非“黄河流域”所及,梁武帝甚至说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他又屡设“普渡众生”的渡苦斋,无遮会,并且三度出家同泰寺,让人民每次出钱一万万赎身,不知这样的常识何以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知道。中国统治阶级这种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由来已久,历代相沿,至今仍有标榜“外来”宗教,宣传耶和華显圣,拜给班禅做弟子,或藉“时榆金刚法会”之类“以维系人民的心理于一时”的把戏。佛教从科学的唯物论的见地是可以批评、应该批评的,但是这自然不能望之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反动的士大夫。在当时的反对者方面有

一位梁朝的范缜，他的“神灭论”乃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文章，可惜这篇社论竟没有表扬这样的科学作品，反而拉了一个南齐的道士顾欢所作“夷夏论”来“力持中国民族的思想！”“夷夏论”在学术上的地位，比佛教的经典更要低得不可计量，里面只有造谣漫骂，如说佛教礼拜是狐蹲狗踞，剃发是受髡刑，不娶妻是绝恶种等等，其无知、无耻与无聊，唯今日各国法西斯派的反共宣传差可比拟。且在顾欢之前即已有东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顾作亦并非“首先”。“夷夏论”既是这样下流的东西，所以不但后世从未有人荒唐到用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在当时亦遭僧俗各方面的严厉抨击（请看弘明集），使顾欢理屈辞穷，无话可对。它在南方既绝无作用，在北方更毫无影响，所谓“其运动之有力，终使佛教改向于中国化”，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南北朝分立，由于汉族士大夫腐朽到极点，异族乘机侵略中原，并非汉族与五胡对佛教有什么争执的意见。南朝盛行小乘教义，北朝盛行大乘教义，各信所宗，互不相犯。达摩见梁武帝谈禅不能契合，北至嵩山，面壁兀坐，北方并无一人借达摩兴兵攻梁。佛教的生存，在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并无区别，如隋灭陈，隋炀帝向天台智者大师卑礼求教，智者大师未尝向隋中央政府摇尾求生存。所谓“隋唐以后，佛教便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不知如何求法。禅宗自慧能以后，宗分南北，派别流行，传播独盛，所谓禅宗改革运动是否指慧能弘法而言。慧能以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慧能以后，唐武宗前后共三次信道灭佛，他们向佛教冲突，佛教求避免而不得，何曾有一次敢主动地对于政府冲突。三宗以外。佛教在禅宗发达以前发达以后，备受帝王士大夫的尊敬布施，更何曾有一次表示对于政府冲突的意思。韩愈号召诸佛老，北宋以来儒者照例要诸一番，以表章“吾儒”的门面，实则暗中剽掠佛老精气性命的教义，附会儒书（主要是“大学”“中庸”），造成所谓“道学”“理学”“宋学”等名称的儒学。照学术史看来，佛道受儒学影响极小，而宋明儒学却受佛老影响极大，与两汉南北朝儒学大异其趣了。

论曰：愿为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则首先必须正视三个真实的具体的事实：

（一）中国文化从来只有促成中国的统一而决计没有助长割据的事情。（二）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都在于政治统一的时期，如秦汉、如隋唐、如宋明，绝无例外。（三）外来文化有时纵为割据分立者所利用，例如佛教，但不久即融会于中国固有文化之中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一类的文化战争。

辨曰：（一）单讲文化的统一性而不讲斗争性，又不区别文化及其统一性的正义性进步性与反动性倒退性，必致误认元、清为统一，而抹煞了异族入侵，国统中绝，生灵涂炭，沦为奴隶牛马的事实；必致误认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汉奸为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必致误认反抗的力量为封建割据破坏文化优秀传统之罪人；必致不敢正视和继承孙中山先生据广东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孙中山先生的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就曾经被那些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军阀百端诬蔑，妄指为“作乱造反”。蒋介石先生民国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中声讨吴佩孚，就指斥过这种诬蔑，说：“其尤不可恕者，则利用国人之专制传统思想，日倡复古，反抗潮流，造谣赤祸，以防民众；托偶像以树威凛，借名教以亮奸诈；欲造成一系天下，遂标榜武力统一，使一般时代落伍之腐儒官僚军人政客，结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阳式的残余腐败势力，以为反动思想之中心。”当此日本法西斯强盗攻掠中国，扶助汪逆伪政权的“统一”，妄称我中央政府为“重庆地方政府”的时候，希望中国谈文化的作者们留意及之，幸甚！

（二）政治统一，也要分清进步的统一与反动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动统一时代，文人学士们或作诗文以歌颂天王之神圣，或讲哲学以巩固君长之威权，宗旨不外提倡专制，

压抑民主，著书汗牛充栋，“发扬光大”的主要部份，如此而已。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今文经说；隋唐以诗赋取士；宋以诗赋经义四六取士；元尊喇嘛教，相传八娼九儒十丐，斯文扫地；明清以八股取士，窒息读书人思想使作代圣贤立言的鸚鵡。凡此所谓政治统一时代的政府，摧残文化如此暴厉，可称“绝无例外”。反之分立时代，也要看这所谓分立是反动统治者的内部分立，还是进步与反动的分立。若在后一种分立时期，则文化不但不会衰落，而且一定发扬光大。例如孔子创立儒宗是在春秋分立时代，战国诸子百家，号称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即如孟荀两大宗师也都是战国诗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大思想家著书立说，都在反抗满清所谓统一的时期，尤显著的是孙中山先生反满清反北洋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发一大光彩，岂是依靠满清和军阀“政治统一”的威胁利诱收买豢养才捏造出来。要之，国家在反动倒退的政治统一之下，文化必然趋于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隶的文化却得以特别发达；在反抗这种反动政治的运动勃起时，进步的文化才可以与之俱兴，直到革命统一以后，进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三) 中国全部历史并无利用佛教进行割据分立之例，所称未知何据。外来宗教古有佛教回教，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耶稣教传播亦渐盛(古代佛回二教外，其他外来宗教不发达)。各教教徒，佛教衰颓已甚，至于戒洁高僧到今天并没有“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回教信徒更是极大多数恪守天方穆圣的遗训，教规谨严，一丝不苟。天主教、耶稣教流传已一百年，不为不久，中国著名人物受洗入教，成为基督徒者不乏其人，他们是否已经“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论者说“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一类的文化战争”，其实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百年史，从文化方面说，就是一部文化战争史。在中国的政治战争史——文化战争史中，宗教战争的成分确是比较少些(绝对纯粹的宗教战争，在世界史上本来是没有的)，但如满清政府屡次屠杀回回民族，不是民族压迫兼宗教歧视的战争么？汉奸曾国蕃反对太平天国，以及义和团之役，不是也带着一部分宗教战争的色彩么？不过论者在这里的本意，原不在研究什么宗教战争，而在于否认文化战争。我们应该正告论者，这种企图不但违背着中国历史的事实，也违背着中国革命与抗战的利益。谁不知道，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不是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文化向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文化和汉奸投降主义文化的战争；谁不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倡合乎世界潮流的自由思想民权政治，满清政府悬赏购头，企图消灭中山先生的肉体生命，袁世凯编一本“国贼孙文”，企图消灭中山先生的政治生命，而反满战争，反北洋军阀战争岂不也就是三民主义文化对那些顽固旧文化的战争。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全部力量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汪逆精卫的所谓反共和平主义的文化，我们的抗战是政治的战争，也是文化的战争——对野蛮与奴役的战争，这更是凡为中国有心人莫能不首肯的。论者一定要抹煞这些战争的文化性质，说这些战争都不是为文化而战，究竟什么人才欢迎这种理论，不是很明显的么？

最后，我对“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的作者仅致沉痛的和诚恳的希望，就是希望彼此都站在反日寇反汉奸的立场上来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和中国历史问题；只要我们都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坚决抗战分子，一定不会忘了王船山先生“今族类之不能仁义，而何他仁义之云云”的遗训。

(原载《解放日报》，一九四三、七、十)

谁革命？革谁的命？

范文澜

蒋介石先生作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闻已通令全国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诵读，并提出批评意见。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看了此书，颇有所感，未敢缄默，略述所怀。

（一）应该学些革命建国的基本知识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企图“决定”中国的命运，首先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至少应该从《新民主主义论》学得几条基本原理，才不至闹太大的乱子。如果有人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硬想对中国的命运也来一下“独裁”，那末，准备着自己连人带马滚到深池里去。

从《新民主主义论》至少该学些什么基本原理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进入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满清政府不懂得这个道理，誓死反抗潮流，保持封建专制，结果被主张民权共和的同盟会推倒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怕懂得或存心忘记这个道理，誓死反抗潮流，积极输入“舶来品”法西斯主义，与所谓“固有文化”的封建专制主义化合而成新专制主义。结果大背国情，民怨沸腾，暴日乘机侵入，造成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

国民党反动派听者：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呀！

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除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外，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半封建关系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针对着这样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首先发起了并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是抗日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民主联合的。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国民党反动派听者：谁能领导抗日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呀！

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与旧文化形态。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

国民党反动派听者：睁开眼睛看看什么是革命的对象呀！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份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与政权构成的基本部份。现在所要建立的中

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国民党反动派听者：决定中国命运的广大人民是要建立这样的—个民主共和国呀！

蒋介石先生既说要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且也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那末，就得实践“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格言，平心静气读—读“新民主主义论”，免得“著作”—部“祸国殃民，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的“圣谕广训”出来，千言万语，画龙点睛处止在反对人民的内战。

(二) 国民党的革命性

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势力。而工人农民又是基本势力的骨干。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也就没有中国。所谓“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所谓“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真有那么—回事么？谁都知道，政党止有领导的作用，它所领导的阶级及其联系的群众才是真实力量的所在。试看国民党领导了那些阶级和群众。

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的“广大”“可靠”的群众是军阀、官僚、政客、土霸、劣绅、闻人、文丐、投机商人、托匪、特务、汉奸、法西斯分子、落后的受欺骗的教员和学生等等。—部份进步的有正义感的党员被压迫歧视甚至被监视，早成党内的寓公。它只在—定时期中与—定程度上有些革命性，而妥协性与反革命性却占了极大的比重。三—四年前，大资产阶级的一部份，以汪逆精卫为代表，率领大批党国要人及“广大”群众投奔日寇，在南京开张新店，翻印了—个“国民党”，—个“国民政府”，—个“领袖”，担任敌后方“剿共”的“天职”，恰恰说明有了这种从反共发展到叛国的“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因之，有了从反共发展到内战的国民党，其去“没有了中国”也就不远。足见反共是亡国的道路，理极明显。现在还在抗战的国民党，在反共反人民—点上也同样克尽“天职”，积极进行全党特务化的工作。特务汉奸与汪记“国民党”交流合作，情同—家。在近时，汉奸吴开先乘飞机“逃”归祖国，大受欢迎，汉奸陶希圣“著书立说”，俨成“思想界”的泰斗，汉奸庞炳勋、孙殿英等三十三高级将领，前后率部投敌，不受惩处，反蒙辟谣奖饰。（七月二十三日中央社还宣传，“庞总司令”被俘前数分钟，慷慨含悲告部属说“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应本以往精神，继续奋斗。”以降敌反共为“继续奋斗，”太丢国家民族的脸了！）这些事实，已使全国人民感到国民党敌我混淆，面目模糊，形迹甚为可疑。在最近，中央社公开广播“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反动要求，并撤黄河防军，集合精锐十六师，企图闪击边区，完成“统—”。更使全国人民惊骇呼号，怒目切齿，绝对反对亡国灭种、大背民意的反共内战。按照“国民不包括反革命份子，不包括汉奸”的原则，以国民为号的国民党，似乎有考虑名义的必要。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的三民主义曾经三变。有同盟会时代以排满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有中华革命党时代收起民族主义的二民主义，有国民党改组至大革命时代，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两大基本任务，联俄容共扶持工农三大政策而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共产党政纲与三民主义基本上有相同的部份，就是指的这个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自从—九二七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叛大革命以来，新三民主义久已高高挂起，无人问津。汪逆精卫于是另制卖国三民

主义，替日寇服务。而新专制主义的三民主义则借暴力推行于国内。蒋介石先生竟敢借三民主义之名，公然抬出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样荒谬的鬼话来侮辱人民。保皇党巨魁梁启超还知道改装门面，来一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花样，这里自称“三民主义”者，却提倡愚民政策，肆无忌惮，其思想比梁启超更倒退一个历史时代。要把这种变质冒牌的三民主义作为“国家的灵魂”，实在是对国家大不敬。幸而中国广大革命民众并无如此丑恶的“灵魂”，因之还能保存国格，坚持抗战，列在四大强国之一。如果“外国人讥笑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劣等民族”，应由“我们”变质冒牌的三民主义者去承受这个侮辱。

在如此国民党，如此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军事则练兵宗旨，侧重反共，所谓军纪军令，不施于降将叛军，却乱施于忠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党务则收罗大批特务汉奸，当作党的灵魂，阴风惨惨，专以破坏革命屠杀青年为能事；政治则贪风大炽，敲骨剥髓，人民逃死无路，民变到处发生；经济则农村普遍破产，百业凋敝，全国经济命脉垄断在少数金融巨头之手（其中主要巨头是蒋介石）；教育则戕贼青年，威胁利诱，强迫接受特务训练，汉奸思想，充当反共的鹰犬。这样做下去，抗日的中国能否存在，已成疑问，何颜吹嘘“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更何颜吹嘘“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输”。如果国民党不放弃反共的宗旨，不改变“革命等于反共”的谬见，即使党和团扩张到异常大，无非增编几千个几万个特务大队，祸国殃民，造更大的孽。中国何辜？人民何罪？要供养这一群反动蝗虫来加深自己的灾害！“权利”“义务”那一套话头，本意就在劝人反共，真正国民是拒绝这种所谓“权利”“义务”的，止有丧失国民资格的“国民”，才会享反共的“权利”，尽反共的“义务”。

现在事情很显然。抗日、民主是革命，反共内战、专制独裁是反革命。测量国民党的革命性究有多少，止要看它做出来的是些什么事情。

（三）谁是真正革命建国者？

中国革命建国的基本势力，也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基本势力，决不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鹰犬们，而是依靠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抗战六周年来已经极明确的证实了这个真理。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来完成革命建国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从危境中挽救中国，并昭示全国人民从抗战中建设新中国的实例。试举几件人所共知的大事，足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战建国的事业上起了什么作用和处在什么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后，“攘外必先安内”正“安”得格外起劲，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救亡，倡导了民族抗战的先声。中国统治者有其一贯的历史传统，故意造成离心离德、“一盘散沙”的局面，以便从中操纵，即大呼“一个党”的国民党本身，也不过是几十个几百个党的一个联合形式而已。中国共产党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耐心组织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在抗日旗帜之下，确立了抗日必胜的基础。西安事变突然发生，汪精卫勾结亲日派准备出卖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当机立断，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先生，因而粉碎了卖国阴谋，结束了十年内战，铺平了抗战的道路。七七以后，中日间正式进行大战，全国朝野缺乏理论的指导，议论庞杂，信心动摇，甚至有人留恋汉奸的诱惑，不能忘情于妥协的死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及时发表《论持久战》、《论新阶

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并随时发表拯危砥顽的重要论文，指示了抗战的正确路程、建国的具体方针，使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人民认识中国命运的归宿地，勇气百倍的向远大目标迈进。国民党顽固反动派掀起皖南事变，企图变解放战争为亡国内战，中国共产党揭破反动黑幕，恰当处理事变，使抗日战争仍得继续进行。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弃地覆军，节节败退，广大领土，相继沦陷，日寇进攻，势如破竹，腹地都市，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独能深入敌后，收复失地，建立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在华敌军一半，对抗伪军全部，从此日寇后顾之忧，不敢长驱前进。至今衮衮诸公，得安居重庆西安，穷奢极欲，腰缠累累，可谓得意极矣。过河未半，就动手拆桥，人之无良，一至于此。中国共产党与广大民众密切结合，自力更生，在各根据地一面抗击敌伪，一面积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丰衣足食的经济的发展，思想自由的文化培养，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无不欣欣向荣，一齐上进，新中国的基础确已奠定。试与大后方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衰萎，军无战意，民不聊生诸现象对照，老朽的旧中国与发皇的新中国俨成两幅不同的图画。从此可知：革命建国的基本势力不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么？领导革命建国成为人民救星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么？抗日与民主，革命与建国是一件事的两面，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么？

止有不敢正视客观实在的人，才敢闭门自造两套孤立的计划。一套叫做以反共为中心的“革命”计划，一套叫做以饭碗为香饵的“建国”计划。谁都知道，反共反民主，国将不国，还有什么建。即使有所谓“国”者存在，仍不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而所谓建，也无非建一个汪逆精卫式的奴化国，或一个百年来老牌的半奴化国。那时候自然会有太上皇制出榨取计划来，十年实业计划“命定”了束置高阁。

所以事情很显然。止有共产党已经实践的团结抗战民主建设才是革命建国的正确道路，也止有共产党才是领导真正革命建国的伟大政党。企图以反共反人民当作革命，以空谈当作建国的野心家，当心“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邻虫”。

(四) 请问究竟想革谁的命？

抗战已进入第七年了，竟还有人认识革命的对象，拿着屠刀，想革革命人民之命。其理由是“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里所谓“今后”当然指本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签订新约日）以后而言。如此说来，一月十一日以前，操持中国命运的是一般帝国主义，把近年来英美对华的友好援助与日寇的暴力侵略等量齐观，毫无区别。甚至借中英中美签订新约作口实，宣传中国已得完全解放，似乎日寇侵占中国大部份领土连同“从前”淞沪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卖国“外交”，一律挂在英美外交账上，随新约的签订一笔勾销，从此中国外交大胜利，万事大吉祥，可以“全在内政”了。我们曾学习过“特别字典”，“革命”的意义就是反共，“内政”就是反共内战。“从前”中国还有“外交”的束缚，所以“安内”不够淋漓痛快，“今后”中国完全独立自由，“内政”大有可为，时哉时哉！机不可失。“操在全国国民的掌上，”这是骗人的话，其意是说，操在中国独裁者蒋介石的掌上。

从这个荒谬思想出发，产生另一个荒谬思想，就是“中国命运，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这等于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公开宣战，说在这“二年”抗战时期内，

企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这也算是先礼后兵，“政治家”的“宽大”态度吧？指桑骂槐的大叫“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样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那就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解决方法了。”骂得好痛快！大概肝火冲昏大脑了吧！其实指骂的那个“政党”，何必老远到“世界上”去找呢？只要不是数典忘“父”，甚至连本人历史也忘了的话，同盟会推倒满清，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不就是这样的政党么？这一大串训斥，好像重逢西太后、宣统皇上、袁大总统、段总理、吴上将军之流的“盛世”，恭读解散国民党讨伐孙中山的严谕，又好像寄居在“王道乐土”，满口诅咒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咆哮。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日寇汪逆都曾说找不出什么合理解决的方法了，甘心在反革命的死路上挣扎拚命，结果呢？失败灭亡。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伟大政党，他和人民大众是血肉一体的，他和中华民族是利害一致的，他不怕任何反革命的威胁，也不怕任何反革命的诬蔑。如果有人拿出所谓“合理方法”以外的“方法”来，人民就会把他踢得粉碎，如果拿出“封建割据”、“变相军阀”、“障碍革命”、“破坏统一”、“妨碍建设”等等缺乏政治常识的谰言来，人民就会嗤之以鼻。

请问国民党反动派到底想革谁的命？想革中国人民之命？想革中华民族之命？如果不是，为什么成心发动内战？难道中国全部沦陷才快意么？难道十年内战还不够惨苦么？

(五) 几个忠告

组织一个庞大无比的特务党，幻想在全国实行一个新专制主义，发动内战，二年中“消灭”共产党及一切进步的势力和地区。这种“朕即国家”的荒谬思想，应该放弃。因为现在是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了。

“军政时期就不能终结”，“宪政无法开始，训政亦无从推行”。这一类反革命话头，应该收起。因为人民早已拜读过“五五宪法”，也亲炙过保甲训政，并不再存些什么幻想了。军政还是“终结”为妙。人民厌苦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不应了“佳兵不祥”的定论么？

“……须知这并不是中国国民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所造成的”。这种“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落伍思想，应该放弃。“须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历史使命决不会落到专制独裁方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满清和北洋军阀可以借鉴。

总之，凡是中国人，万万不可存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思想。从这种思想发生的言论，一定引起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发出这样的声明：“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是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天乎冤哉！一个堂堂中国国民党总裁，抗日六年的领袖，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所著的一本自认为“革命”到了顶点的书，却被我们的敌人誉为“方向没有错误”，认为不过是“重复帝国声明”与“抄袭汪精卫”，即使作者不害羞，国民党人不知耻，中国人民是不能饶恕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侮辱的。中国人民有责任纠正自己队伍中个别人们与个别集团的思想错误及行动错误，彻底